

# 三晋武术发展的文化地理学探析

宿继光 刘定一

(中北大学体育与艺术学院, 太原 030051)

**摘要:** 采用文献资料法等方法, 以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对三晋武术的产生、繁荣与发展进行研究, 指出在特殊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的共同作用下,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晋武术文化。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其文化遗产的继承、创新与发展, 并为中国多元武术文化的共存和融合提供参考。

**关键词:** 民族传统体育; 武术; 文化; 地域; 三晋

随着文化地理学的发展, 区域文化研究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繁荣时期, 并以一定区域为对象的文化地理学研究受到了广泛关注。作为中华民族长期发展过程中不同地域间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汇的产物, 作为一种承载不同的地域文化内涵丰富与发展归属的文化形态, 中华武术显著的地域特征也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 有关地域武术文化的研究正逐渐成为当前武术文化研究的一个新兴热点。我国地域辽阔, 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 文化的发展也体现出多样性, 所以, 各地武术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和民族性特点。这种各具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武术文化互相交流和融合, 构成了门派繁多、风格迥异的中华武术文化系统。

据上世纪 80 年代的武术挖整工作统计, 山西现有拳种 65 种, 其中具有地域特色的拳种 40 余种,<sup>[1]</sup> 武术文化资源相当丰厚。但就目前山西武术的研究现状来看, 在研究层次上, 还多停留在“技术”层面或局限于某一方面, 记录式的研究成果较多, 把它们作为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化进行深入探讨还颇为少见, 缺乏深层次的文化属性研究, 对武术文化的发生、发展与当地、当时社会背景的关系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以地域文化为背景对三晋武术文化进行研究, 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三晋武术文化遗产, 创新与发展三晋武术文化; 促进区域文化与武术研究向深层次、高视角发展有重要意义。

## 一、特定区域文化与三晋武术的产生与发展

三晋的地域概念是古代沿袭和俗称的历史区域, 它在产生之初是精确的, 但由于漫长的历史逐渐泯灭了它的地理学意义, 变的疆域模糊, 景物易貌, 人丁迁移, 只剩下大致的所在地区了。岁月的流逝虽然改变了古代区域的精确性, 但这种模糊的“地域”观念已经转化为对文化界分的标志, 深深地积淀在人们的头脑中, 并且产生了深远、广泛的影响。

“三晋”之称最早见于《战国策·赵策》, 其本义是指春秋之后瓜分晋国的韩、赵、魏。因为这三国的开国者原来都是晋国的卿, 故称三晋。显然, 三晋一词原本是国家概念, 并不是指山西。自北魏王尊业的《三晋记》以及稍晚的《三晋山险记》两种地方志出现后, 三晋便以地域概念出现, 变成山西的代名词了。直至明清时期, 文人墨客多以三晋雅称山西。<sup>[2]</sup> 究其原因, 一则因为国家概念的三晋的确与山西有密切的关联; 再则单音节的词不如双音节的词顺口, 所以多用三晋代称。在传统的地理意义上山西主要是指太行山以西地区, 现代意义上山西的地理范围在元朝时基本奠定, 在明清时期略有变动, 但核心区域大同小异。本文研究的地理范围以现今山西省的行政区域为基准, 比作为国家概念的三晋地理范围略小。在这里, 我们对“三晋”与“山西”不进行学理上的严格辨析, 仅是地名雅称的沿袭。由于地理环境与历史背景的原因, 三晋文化无论在学术思想还是民俗事项中,

**基金项目:** 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 三晋武术文化研究(2008J019)。

**第 1 作者介绍:** 宿继光(1978-), 男, 太原人。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武术理论与方法研究。Tel:13994201456, E-mail:sjgtiyu@163.com。

都有一条主线贯穿于其中：质朴、豪放、务实。这是土地贫瘠而文化积淀丰厚的三晋大地培育的结果，是三晋人民情感、愿望、理念和志趣的结晶。

武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存在，它的发展一定不是孤立存在的。三晋武术的兴盛必然与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民风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浸染于三晋文化之中的三晋武术从来不乏名家、名拳，无论是形意拳、太极拳还是少林拳均与山西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这块表里山河的土地上不仅孕育了许多风格独特的地方拳械。而且，伴随着明清时期晋商的“车辙马迹”，三晋武术逐步走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三晋文化为三晋武术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要想全方位研究三晋武术及武术文化，就应当将更多的目光放在三晋文化的背景之下展开。探究武术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区域文化的影响，无疑可以使我们对武术的发展有更为清晰的理解和认识。

## 二、“表里山河”的地理特征造就了三晋武术文化的独特风格

自然界是文化产生的土壤，文化的生成与发展不可脱离地理环境。冯天瑜认为，地理环境是文化创造的自然基础，“如果把各民族、各国度有声有色的文化表现比喻为一幕接一幕的悲喜剧，那么，这些民族、国度所处的地理环境便是这些戏剧得以演出的舞台与背景。”<sup>[3]</sup>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也认为，全部历史都必须用地理观点来研究，地理提供了历史和文化的自然背景和舞台场景，历史事实与它联系在一起才具有意义。<sup>[4]</sup>因此，地理环境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人类意识或精神的基础。不同的地理环境与物质条件，使人们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

三晋大地具有鲜明且富有特色的自然环境，自古被称为“表里山河”。“表里山河”在这里绝不是一句轻松的言语，而是山西地貌的真实写照。据清光绪《山西通志·风土记》载：“夫山西，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之外蔽，而句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孟津渔关皆吾门户也”<sup>[5]</sup>。山西南下和东去出口要过巍巍太行，太行山以“八陉”沟通河北平原与山西高原。魏武帝曹操在过太行时就对此发出过无限感慨：“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北上和西去也是异常艰险。西去要穿越大山吕梁，再加之黄河自古天险，向北则穿过筑于重重山峦之间的长城各口。在这个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哺育了山西人独特的性格特质。正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论述到：地形条件的不同，影响着人民的生产、生活形式和性格的类型，从而影响着各个民族在历史上发生、

发展及其所处的地位。<sup>[6]</sup>

古籍中认为自然环境对性格的影响具有重要作用。《祝志·辽州》记载：“山川险绝，其民信实纯厚，其俗刚悍朴直”；宋代谢惊《清虚观记》，认为汾州（现晋中一带）“地高气爽，土厚水清，其民淳且重”，光绪《陵川县志》也称“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可见，除了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条件及尧舜遗风等文化因素的影响，山西人受当地山多地少、天寒风烈的地理环境以及气候因素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有诗云：“雁门关外野人家，不植桑榆不种麻。百里并无梨枣树，三春哪得桃花花。六月雨过山头雪，狂风遍地起黄沙。说与江南人不信，早穿皮袄午穿纱。”<sup>[7]</sup>恶劣的地理环境，却造就了晋北人民尚武、善骑射的拼搏奋进精神。自然环境对性格的影响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曾于19世纪几度来华的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在中国旅行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越往山区的人越清洁，秩序也越好，随之而来的是性格也越来越善良了”。山西人正是这样的山区之民，在表里山河的地理环境中形成了真淳、务实的性格特质。

汾河水哺育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反对不重内容专讲词章的形式主义：“稂莠秕稗生于谷，反害谷者也；华辞丽藻生于文，反伤于文者也。”<sup>[8]</sup>他的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从而在创作过程中证实了他提出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理念。清代晋阳学者傅山一生“以济世自见，而不屑于空言”。他针对书法艺术提出的“宁纯无利，宁拙无巧，宁朴无妩”，反对利、巧、妩的形式美，追求纯、拙、朴的自然美。<sup>[9]</sup>傅山先生创编的傅山拳法结构严谨，沉着稳健，朴实无华同样体现的是这种纯朴的自然之美。黜华尚实的性格特质深深的根植于三晋文化之中。在三晋文化的浇灌下形成了以形意拳、鞭杆等为代表的具有三晋地域特色的地方拳种。这些拳种表现出朴实矫健，简洁无华的特点其正是三晋文化的沉积与反映。产生于山西的形意拳技术简洁朴实，动作严密紧凑，大多直来直往，一屈一伸，节奏鲜明，“出手如钢锉，落手如钩竿”，“迈步如行犁，落脚如生根”，体用兼备，突出技击。鞭杆亦称短棍，取自于赶牲口的“鞭杆”，吸取长短器械的技法形成独具地方特色的拳种。鞭杆的产生首先依赖于三晋大地的地貌特征适合马帮驼队的行走，其技法表现出了晋商含蓄、内敛的性格特点“手不离鞭，鞭贴身走”，动作干净利落，身械协调相随，没有拖泥带水。

## 三、“拱卫京师”的地缘政治成为推动三晋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山西自古多险地，千秋不易太行山”。山西表里山河、易守难攻，距京师仅数百里，实其右臂，素称

用武之地。从春秋战国起，这里发生过一系列的著名战役，构成了三晋历史的重要内容。唐帝国和沙陀三王朝都是由太原起兵进而逐鹿中原，建立政权。由于山西重要的地理位置，再加之其邻近塞外，所以自古就是“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番”。唐朝以前，首都主要在西安；五代以后，首都主要在北京。山西处在北京与西安、洛阳之间，这种屡在首都附近的政治地理特点，使山西成为拱卫京师的兵家必争之地“拊天下之背而扼其吭”形象的反映山西在中国历史上的战略地位。晋国于此，励精图治，开疆拓土，尊王攘夷，成就百年霸业。韩、赵、魏三分晋国，鼎峙中原。汉由此西击匈奴，唐由此北逐突厥，屹然为中原文化屏障，邦国砥柱。历代英杰凭倚干城，每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因而顾祖禹说：“京师之安危，常视山西之治乱”，“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sup>[10]</sup>从秦汉至明清（公元前221年—公元1840年），以统一时期为例，1593年里只有明初52年都城位于南方，北方建都时间长达1541年，占96.7%。在上述2061年中共计战役840次，其中在山西境内的战役为125次，占战役总数的14.9%。<sup>[11]</sup>故三晋文化，常有金戈铁马之韵。

战争固然是有破坏力的，是残酷的。但同时，由于战争的大量进行，也使这一地区的人民养成了刚毅的性格，有利于尚武精神的最终形成。尚武精神则又反向强化了人们“勇武强悍”、“坚韧刚烈”的性格特质。战国时代的豫让、盖聂等剑客，开启了三晋武侠文化之先河。这既佐证了三晋武术文化的深厚根基，又给三晋文化的尚武精神注入了活力和内涵。

三晋北通塞外，南控中原，地处华夏民族与周边戎狄部族交错杂处的特殊地带，像一支臂膀从草原直插中原腹地，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冲撞和融合的地区，人文和地理环境极为复杂。历史上的三晋大地曾经几次经历游牧区和农耕区的变化，北部强盛的游牧民族始终通过这里与中原地区保持着不同形式的联系。中原文化与北方的游牧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融合，由此形成了三晋文化的一些特质。

在历史的长河中，华夏民族与游牧民族有过征战和对抗，但更长久、更深远的却是彼此和睦共处，取长补短，相互渗透，直至以汉为主，溶为一体，共同创造了三晋文化。三晋作为民族文化的熔炉，在民族关系问题上，已突破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极端狭隘的宗法血缘观念，也突破了孔孟“以夏变夷，未闻以夷变夏”的单向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框架。<sup>[12]</sup>而是早在叔虞封唐时便制订了“启以夏正，疆以戎索”的双向民族政策。汉魏之际，匈奴内迁。两晋南北朝数百年间战乱扰攘，促成空前的文化大交汇和民族大融合，北方新鲜血液注入古老的华夏文明，催生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巅峰——盛唐时代。纵观三晋历史，在

长期文化融合过程中，一方面促进了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提高，使华夏文化远播北方，为祖国北方辽阔的疆域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游牧民族强悍粗犷与豪放浪漫的文化品格给三晋文化注入了活力与生机。三晋人民形成“人性劲悍，习于戎马”的人文特点，造就了勇武强悍、不畏艰险的性格特质，为三晋武术的发展培育了人文环境。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说：“五胡不是野蛮人，是牧人，他们带来的有战乱，但不止是战乱，还有北方民族充满活力的气质与气魄”。<sup>[13]</sup>

#### 四、“汇通天下”的晋商推动三晋武术走向繁荣

明清之际，山西社会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晋商，他们利用政府“招商输粮而与之盐”的政策，经过商品交换、货币汇兑，逐步发展成为富可敌国的商帮，执中华金融牛耳五百余年。晋商在繁荣地方经济，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促进了武术的发展，使山西这一特定的区域在明清的武术发展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明清晋商作为一个称雄华夏数百年的商帮，必然与其所在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民风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对当地社会变迁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正是在这一时期，山西武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武术名家辈出，大量拳种出现，并有武术著作问世。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有其历史发展中的必然。

明清晋商对三晋武术的发展起到的积极因素是显而易见的，商业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成为武术发展的最大驱动力。明清之际山西商人富甲天下，他们一方面从实际出发，需要大量的习武者对其提供安全的保障，带动了镖局行业的发展，使全国各地武林高手汇集三晋，在保镖的过程中山西的武林高手又拜访各地名师，促进了武术内容的交流和水平的提高；在商品交换和流通过程中，由于山西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出于旅途安全的考虑，迫使晋商加强了自身武艺的修养，同时发展了三晋地域武术，丰富了武术拳种。另一方面山西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底蕴深厚的武术文化，孕育了晋商尚武的人格特质。这种人格特质决定了晋商对武术具有极大的兴趣，不但请拳师护院待为贵宾，而且利用在外经商的机会投师学艺，直接或间接的支持着武术的发展。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社会推动力量，在明清时期三晋武术才得以蓬勃发展。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精武者代不乏人，甚至有的乡村凡男儿就有几分功夫。在这样浓厚的习武氛围中，山西各地出现了丰富多彩的武术流派和拳种。<sup>[14]</sup>

#### 五、结语

根植于黄土地，由黄河水哺育成长的三晋文化，源远流长，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晋武术文化是产生于三晋文化肌体之上的一个文化现象，文

化的产生和发展是随着人类的发展历程而前进的,任何文化的存在与发展,离开了特定的环境即无法存在。正是在特殊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的三晋武术文化,其资源丰富、底蕴深厚。在三晋武术的历史上从来不乏名家、名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中国武术乃至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这显然是不同的文化地理环境共同影响的结果。

#### 参考文献:

- [1] 山西武术拳械录[M].太原:山西省体育运动委员会武术挖掘整理组,1985.
- [2] 刘纬毅.三晋文化的特质[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51(1):62-68.
- [3][4]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册)(第2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7,18.
- [5] 山西“东西”论[EB/OL].娄底新闻网. <http://www.ldnews.cn/news/globalnews/economicnews/200808/200808141700>

(上接第86页)

了武术的娱乐功能、教育功能与健身功能。武术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一直沿革至今而没有被淘汰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武术是随着历史进程不断发展着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在需求越来越多样化的现代社会,武术的发展也必将循迹于多元化的“综合创造”之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论武术朝着何种方向发展,都是文化融合与大众选择的结果,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

#### 参考文献:

- [1] 温力.中国武术概论[M].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
- [2] 王岗.中国武术文化要义[M].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 [3] 邱丕相,吉灿忠.对北京奥运会后中国武术发展的思考[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9.03.
- [4] 田学建,邱丕相.全球化视野中传统武术发展策略研究[J].中国体育科技,2007:5.
- [5] 文善恬.竞技武术,歧路之羊?——武术发展要警惕一种

46\_2.html.

- [6] 白寿彝.中国通史 第一卷 导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115
- [7] 丰驰.大同历史环境考略[J].文物世界,2008(2):59-61.
- [8] 陈燕.白居易的诗歌理论[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43-45.
- [9] 施荣华.论扬州画派的美学风格[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35(1):72-78
- [10] 山西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0:7038.
- [11] 李燕茹,等.中国历史战场地域分布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J].人文地理,2001,16(6):61-68.
- [12] 王志华.三晋文化的历史特色[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4(49),22-24.
- [13] 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71.
- [14] 行龙.从社会史角度研究晋商与地方社会[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8(1):62-66.

“去竞技化”倾向的回潮[J].体育科学,2008:11.

- [6] 高成强.传统武术流失现状与保护对策的研究[J].2008.03.
- [7] 方国清.自我与他者: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武术文化认同的研究[J].2008.03.
- [8] 王飞,曾天雪.武术在全球化浪潮中所肩负的历史重任——近30年来武术全球化发展的回顾与反思[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9.07.
- [9] 曾秀霞,张瑞洁.中国传统武术文化价值和发展方向探骊[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08.07.
- [10] 吴松,王岗.中国武术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文化之争[J].体育学刊,2007.12.
- [11] 王岗,潘冬法,包磊.中国武术的当代势力[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9.09.
- [12] 王国凡,刘徐军,卢玉.对后奥运时代我国群众武术发展的设想[J].2009.09.
- [13] 叶朗.现代美学体系[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 [14] 周伟良.简论传统武术的思维方式[J].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7.06.